

从晚清到五四： 亚洲主义在中国的消退及其后果

赵京华

摘要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曾出现过一次不大不小的讨论“大亚细亚主义”的热潮，其中李大钊所倡导的以殖民地解放、民族自决和世界主义为主旨的“新亚细亚主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然而，随着后来中国人亚洲意识的消退，作为区域合作思想资源的这场讨论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本文试图穿越历史烟云，追溯和勾稽近代以来中国“亚洲主义”思考的来龙去脉，分析其消失的原因及后果，并尝试思考 21 世纪东亚区域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为构筑全新的区域主义思想提供历史参照。

关键词 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 李大钊 东亚区域合作问题

作者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5-0121-12

相对而言，中国人缺乏区域主义的思考理念，历史上也少有地区联盟合作的思想资源。仅就“亚洲”而言，比起“二战”前的日本和 1980 年代以来的韩国等，中国人的“亚洲主义”或“东亚意识”比较淡薄。这当然有着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是：实际上在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也曾出现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大亚细亚主义”的热潮。虽然，它在中国整个近现代思想史上只是一道涓涓细流，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观念理论。但那于“一战”爆发而世界政治秩序发生重大改变背景下，在与亚洲主义发源地日本既谋求交流又激烈抗争过程中出现的议论，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日本亚洲主义的逻辑结构和政治取向，反思中国之区域合作观念的薄弱，乃至今天我们如何构筑全新的区域主义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讨论“大亚细亚主义”的热潮，大致出现在 1916 年至 1919 年之间，以《东方杂志》这一全国性大型舆论媒介为主要阵地，并有《国民》等报刊参与，稍后成为引领舆论新潮的《新青年》没有直接刊登相关的文章，但一直对“一战”后的文明冲突论、世界区域化走向和门罗主义等保持关注，而其主将之一的李大钊更是热情投身这场讨论的核心人物。这场讨论起因于积极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本自 1916 年前后开始出现新一轮有关“大亚细亚主义”的论述，这一论述依据处理国际关系的旧有势力均衡论，其根本目的是为在“一战”中获得势力扩张并积极推进其殖民性“大陆政策”的日本帝国主义确立舆论基础。这对当时弱势的中国构成压力和威胁因而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同时结合“一战”结束而世界格局面临重大重组的时势，也促使人们去思考本国、地区和全球未来的发展走向，因而讨论中甚至出现了李大钊所代表的以殖民地解放、民族自决和世界主义为目标的“新亚细亚主义”之倡导。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这场讨论并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收获更多足以为人

思考区域合作问题所借镜的思想资源,反而连同其晚清以来中国人积累起来的亚洲主义或东亚意识的思想谱系一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那么,在欧洲大战即将落幕而世界革命已然风起云涌并促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历史当口,五四前后这场有关“大亚细亚主义”的讨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其讨论的热情包括中国人亚洲意识的随后消退,又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学术思想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在此,我将从晚清以降中国人亚洲意识的发展演变过程,大战后的全球危机,区域联盟的新趋势,民族自决和世界革命理念的交错出现,以及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化之日本的复杂关系等等入手,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来开掘历史,以对上述问题给出自己的分析。同时,尝试思考 21 世纪东亚区域合作的可能性问题。

促使我认真思考这一课题的,还有另外一个学术考虑。亚洲主义,这个最初发源于近代日本底层民间的“情绪”逐渐演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战略”,它给周边民族乃至世界带来的灾难已是昭然若揭的历史事实。这使得东亚地区的人们谈亚洲主义唯恐避之不及。“二战”以后,日本几代知识分子曾对此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反思,虽然其中也不乏有试图对此重新加以肯定的倾向。日本知识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为了突破东西方二元对抗的冷战格局而创建新的合作共生之亚洲观,必须彻底清理战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和严重污染的旧亚洲主义思想,剔除其中以“日本盟主论”为核心而无视其他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原则的殖民侵略性。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日本以外地区和国家学术思想界的呼应。实际上,日本“二战”以前的亚洲主义尤其是后来那个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其最大的欺瞒性在于它声称要“解放亚洲”,可这个“亚洲”广大区域的人们自始至终并没有认可他们的“解放”号召。这是为什么?如果今天我们能够从日本帝国当年声称要“解放”的亚洲国家“中国”这一视角出发,挖掘中国人何以不接受日本亚洲主义的现实原因和历史逻辑,那将从对象的角度进一步检验日本亚洲主义的失败教训,从而加深我们对历史正义的理解,并为创建 21 世纪崭新的区域合作之亚洲观打下坚实基础。

一、19 世纪区域主义的潮流与日本的亚洲主义

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自 19 世纪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亚洲,世界各地出现了彼此相互抗衡的“泛……主义”的流行。如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泛美主义(Pan-Americanism)和狭义上的泛欧主义(Pan-European doctrine)。这种运动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即最初处于弱者地位的民族和人群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而谋求联合抵御外部势力的压迫,从而产生民族和区域连带的解放运动。但是这种源自民间社会的运动在后续发展中往往为一个核心的强大民族或国家(帝国主义)所利用,来推行区域内的霸权和势力范围的扩张。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从弱小抵抗强大到强权压迫弱小的关系转换,而在此转换关系中,蕴含了新的帝国主义征服与被征服的结构颠倒。这从“泛……主义”后来也称“大……主义”的名称变化中,也可看出其中的消息。因此,到了“一战”结束的 1918 年,李大钊便明确指出:各种“大……主义”虽在范围之广狭和性质之区分上不同,但“其本专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扩张一己之势力于固有之范围以外则一”,乃是专制和强权的隐语。^①

泛亚洲主义的产生为时较晚,这当然与亚洲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最后一块处女地有关。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于中国,1853 年美国佩里将军的黑船来航日本,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东亚紧锁的门户。而沙俄帝国为了寻找不冻港出海口不断向东南扩张,引起了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紧张和势力争夺。恐怕是由于老大中华帝国长久处于地区和世界的中心位置或者因为衰败已久而觉醒缓慢,我们从一开始就缺乏联络弱小而实行周边区域联盟的亚洲意识,故泛亚洲主义首先产生于明治维新成功后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胜利期间的日本。竹内好曾提到:幕末和维新之初日本民间出现亚洲连带意识,当时也使用过“泛亚洲主义”的称呼,后来才为“大亚细亚主义”之名所取代。这也印证了日本一般辞书对“大亚洲主义”词条的解释:

主张为了抵御欧洲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各国应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与日本的独立问题相关

^① 李大钊:《Pan……ism 之失败与 Democracy 之胜利》,《太平洋》杂志 1 卷 10 号,1918 年 7 月 15 日。

联，自明治初年起便开始倡导亚细亚连带论，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论者当中，其主张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差异。……进入明治20年代以后，随着民权论者放弃亚细亚连带论、自由民权运动进入低潮、天皇制国家机构的确立以及面对清朝扩充军备的局势，大亚细亚主义开始抬头。……其后，大亚洲主义与天皇主义一起成为许多右翼团体的主要口号，并为企图摄取满蒙利益的日本政策服务。^①

正如美国的门罗主义一样，“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的事情由东洋人来处理”，这是亚洲主义的基本要义。所以，亚洲主义有时候也称亚洲门罗主义。已有学者指出，亚洲主义在日本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1870—1880年代亚洲连带论式的泛亚洲主义诞生于民间。其中，既有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式朴素的由联合亚洲走向大同的亚洲主义，同时也出现过福泽谕吉“日本盟主论”、陆翔南“支那保全论”式的亚洲主义。第二，到了1895年至1920年代，原初的泛亚洲主义开始向“大亚洲主义”转变。尤其是在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前后，日本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支那保全论”，民间的亚细亚连带情绪逐渐被吸收到国家推行扩张的“大陆政策”中，而“一战”期间日本在“解放”与“侵略”亚洲的抉择中最终走向了后者。到了1924年美国开始实施排日移民法案的时候，日本反欧美的声浪逐渐高涨，大亚洲主义开始盛行。第三，“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3年，由近卫文磨、广田弘毅等所组织的“大亚细亚协会”则完全成为日本帝国对外侵略的“翼赞体系”之一，有关亚洲的论述其重心也从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冲突论和文化连带论转向国际关系乃至世界秩序重组的政治层面。而在日本“二战”前的亚洲主义思潮演变过程中，产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间的“支那保全论”，成为近代日本大亚洲主义发生质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它也处在亚细亚主义与“大陆政策”的连接点上^②。

就是说，发源于日本的亚洲主义也有一个从民间发动到国家借用而成为争夺地区乃至世界霸权之思想舆论的转变过程。了解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晚清以来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也曾抱有亚洲主义的情结或东亚意识，而其发生发展乃至消退都与日本的亚洲主义息息相关。“二战”以后最早重提亚洲主义议题的竹内好曾经指出：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其基本特性在于内部的千差万别，它并非一种具备实质内容和可以在客观上加以限定的思想，而是一种倾向性。亚洲主义与民族主义不完全一样，但确有一部分与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相重叠。就是说，这是从明治维新后的膨胀主义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果实。竹内好还认为：“亚洲主义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等不同，其自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必须依靠别的思想主义才能展现出来。因此，我们无法追溯其历史上的展开过程。”^③我理解，竹内好在此是要强调日本亚洲主义的不具有原理性，我们难以对其进行概念史之追本溯源的考察。这个观点提醒我们，在观察这种主义乃至受其影响而发生的中国人之亚洲意识的时候，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结合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并在与其他思想观念的联系中，来分析亚洲主义发展和消亡的轨迹。

亚洲主义难以定义，其历史上的逻辑展开过程不易追溯，这给我们的考察带来了重重困难。为了分析的方便起见，以下再就亚洲主义的类型做些辨析。从思想的构成要素和逻辑依据上观之，我们可以把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亚洲主义分为“文化亚洲主义”和“政治亚洲主义”两大类型。“文化亚洲主义”与19世纪以来的文明论、人种学、文化传播论相关联，强调某一民族和区域的历史、文化、语言方面的共通性以谋求“同文同种”之上的连带与结盟，早期的泛斯拉夫主义也有这样的性格。在日本，这一类型以冈仓天心、中江兆民、宫崎滔天为代表。“政治亚洲主义”则与19世纪末出现的区域主义包括政治、外交上的各种“门罗主义”，以及发源于欧洲的均势论密切相关，它承认某一霸权的中心地位并以此为盟主实现超国家的区域扩张，实际上往往成为某一帝国的区域霸权主义。如果说“文化亚洲主义”是一种朴素民族主义的扩展，那么“政治亚洲主义”则是建立在区域联合基础上的一种国家战略。在日本，以北一辉、大川周明、腊山政道等为代表。当然，这只是一种简便粗浅的分类，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往往是文化和政治要素缠绕在一起的。

① 中下邦彦编：《亚细亚事典》，东京：平凡社，1959—1962年，第6页。

② 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33—337页。

③ 竹内好：《日本的亚洲主义》，《日本与亚洲》，东京：筑摩书房，1963年，第293—294页。

二、晚清至“一战”之前中国人的亚洲意识

明治时期的日本曾经是亚洲革命者的聚集地。中国反清排满的志士以及戊戌变法失败后的革命党人，大都有流亡日本的经验。他们在日本结识民间同情中国革命的亚洲主义者（大陆浪人等），也感染了联合东亚以抵御西方列强这样一种日本版泛亚洲主义的思想。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宋教仁与北一辉的亲密关系，乃至日本亚洲主义者的支援同盟会和援助辛亥革命，都是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以下，我将从文化亚洲主义和政治亚洲主义的角度，简要追溯晚清至辛亥革命前后一些中国人所怀抱的亚洲主义或东亚意识，并确认其最终消退的踪迹，以作为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大亚洲主义”讨论再起的前史与背景。

据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观之，晚清以降最早萌生“亚洲意识”的重要人物是1877年随使日本的外交官黄遵宪。黄曾强烈反对日本对琉球的吞并，但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文化新气象抱有好感，所著《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详述明治维新后的移风易俗，期待清廷能够效仿日本而实施变法。由于他出使的时期是在日本发动两场大的对外战争之前，即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阶段。而中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未发生根本的逆转，东亚汉字儒教文化圈的余韵犹存，两民族同时面临着来自欧美的西力东渐。黄遵宪在坚信中日“同文同种”并认可当时流行的均势论基础上，曾以建议朝鲜使节的方式提出东亚联合以抗拒俄国扩张的设想。作于1880年9月的《朝鲜策略》，便是献给朝鲜赴日修信使金宏集的一篇策论。黄首先表明，当时的沙俄帝国开疆掠地侵略成性，在西欧因英法联合维持，其侵略扩张难以得逞，故势力转向东亚。而在东亚“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于是，他向朝鲜使节提出亲中、结日、联美以图自强的建议。^①

黄遵宪应该是中国近代最早拥有“亚细亚之大局”意识的人物。他身处东亚历史发生巨变而霸权结构还没有根本转变的时刻，其思考仍然处在传统的汉字儒教文化圈和19世纪均势论的范围之内，其东亚意识也难以用“文化”或“政治”的亚洲主义来加以分别。而不久之后亡命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乃至后来的章太炎，其所感染的亚洲意识就多少有了文化与政治倾向上的分殊。1898年戊戌变法后逃亡日本的康有为，曾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倡导者近卫笃磨讨论说：“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利。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门罗主义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②观察康有为这一段有关“亚洲门罗主义”的议论，感到在他的思想谱系中很是孤立。或者，他只是援引当时流行的美国门罗主义，在应酬日本政治家的谈话中，从地区政治的角度有所涉及而已，也说不定。与晚清以来的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康有为并没有足以称得上“主义”的亚洲思考。

同样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感染并肯定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同时，也曾怀抱于亚洲实现中日联合的意识。他所谓的“亚粹主义”出自《清议报叙例》（1898）所宣示的以下宗旨：“（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在《论学日本文之益》（1898）一文中，更谈到“合邦”的理想：“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台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焉。”^③梁启超流亡东瀛期间，深受日本社会思潮的感染，其西学也基本上得之于日本书籍的媒介，并对这个岛国抱有好感，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我们看这两篇谈到中日联谊共铸东亚文明的文章，可以知道他完全是从“文化亚洲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中日联谊共同保存和发扬亚洲的文化精粹，至于“合邦”的理想只是在共同抵御西方势力“东渐”的前提下，从人种学和文明论的角度强调“协同提携”，而落脚点仍在文字语言的相互学习上。晚清以降，这种“文化亚洲主义”或者由此而来的“东亚意识”，乃是与日本有渊源关系的中国人士比较常见的一种倾向性。

①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黄遵宪》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8—85页。

② 《与康有为的对话笔记》，《近卫笃磨日记》2，同刊行会编。转引自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4—95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0页。

因《苏报》案被关押三年后同样来到日本的章太炎，曾于1907年在东京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发起“亚洲和亲会”而倡导“亚洲亲和主义”，其出发点亦以文化和宗教相号召。但是，他明显地对于邻邦日本已经开始抱有戒心。这恐怕与其间爆发了日俄战争而日本对外扩张之民族主义高涨，同时“帝国主义论”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流行有关。章太炎亲笔拟定的《亚洲和亲会约章》开宗明义亮出反帝、解放的旗帜：“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帮族。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用振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凡我肺腑，种类繁多，既未尽集，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就是说，亚洲亲和会在于“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去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其会员“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皆得入会”。^①这不仅与当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截然不同，其亚洲想象甚至跳过日本而谋求中印两大文明的直接联系。我们知道，当时在章太炎周围曾聚集了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众多革命家，共同探讨反抗西方列强而谋求解放亚洲的计策。与梁启超等不同，章太炎对日本的扩张行为破坏亚洲安全，多有批评。周作人曾有回忆：太炎先生亡命东京期间，有人来求字，常抄《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以赠人，对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表示愤慨。^②到了1917年章太炎创立“亚洲古学会”，则意在叙“同洲之情谊”，联“各国之学识”以振兴亚洲文化，他的“亚洲亲和”明显是一种基于文化宗教共通性的联谊和“想象”。

汪晖通过梳理《东方杂志》创刊伊始对日俄战争和东亚问题的关注，曾得出结论：由于日本的“大东亚”思想与欧洲的“文明冲突论”之间存在着相互衍生的关系，且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故“1905年以后，以黄种为中心，以中日联合为内涵的亚洲论逐渐退潮。代之而起的，是用帝国主义范畴观察包括日本在内的霸权国家的扩张策略”。^③如果说，章太炎的“亚洲意识”已经包含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内涵和倾向性，那么，辛亥革命之宪法主要设计者宋教仁对日本政治亚洲主义的尖锐批判，就更能显示这样一种根本的变化。宋在革命前曾流亡日本六年，对其政治文化深有所了解，也结识了众多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亚洲主义者，如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他作于1911年的《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一文，可以说是革命党人中最早洞察到日本巧妙利用国际法夺取中国台湾、朝鲜，最终欲扩张于大陆之帝国主义野心的人物。而此文的深刻犀利，足以象征着中国人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最终南辕北辙，其东亚意识在辛亥革命前后迅速衰落的轨迹。

文章中，宋教仁讨论二十年来的时局，首先认定东亚乱局的祸源在于日本：“呜呼，自海通以来，东亚大地嚣然不靖者，垂百年矣！……其有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原因。”在历数日本历史上常有吞并东亚之野心，维新后取琉球、台湾，而自明治十四年（1882）始开始图谋向外发展后，结论道：“而环顾四方，惟脆弱之朝鲜与老大之支那尚可问鼎之轻重，于是殿手三韩，伸足辽东，长驱以入禹域之政策，遂为彼国唯一之国是，而东亚天地无宁日焉。是日本吞并东亚政策之所由来也。”可以说，这是对日本形成于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最有力批判。而文章第二节详述甲午战争的起因，强调日本人阴谋推动朝鲜内部的东学党运动，以诱导中国出兵而挑起战争，驱逐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为日后“合并”铺平道路。宋教仁尤其注意到，日本巧妙运用国际法而使朝鲜脱离中国藩属国地位，最终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导致西方列强纷纷来瓜分中国者，其实也正是日本。“夫以新兴之日本，猝得过大之势力于中国，必招他国之嫉妒干涉，或起而效尤，以致极东大局摇动，……吾固曰：日本者，实扰乱东亚和平之张本人也。”^④就是说，日本不仅是扰乱东亚局势的罪魁祸首，同时其帝国主义行径也诱发了西方殖民者纷纷来瓜分中国。我们不能不说，唯有宋教仁这样的与日本深有渊源的革命家，其日本认识才能达到这样的思想深度。

而此时，日本民间的文化亚洲主义已然被吸收到政治亚洲主义之中，即与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合二

① 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1页。

② 周作人：《日本管窥四》，《知堂乙酉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8页。

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宋教仁》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7—122页。

为一,成为一种具有侵略性的“大亚洲主义”。宋教仁的深刻剖析和尖锐批判,不仅象征着晚清以来中国革命党人与日本亚洲主义者(大陆浪人)蜜月期的结束,更代表了中国人对日本版泛亚洲主义的失去信心和兴趣。当然,即使到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强权无理的“二十一条”前后,革命韬略家孙中山依然没有放弃与日本政界、民间的广泛交往,甚至还抱有日本能够支援中国摆脱“次殖民地”状况的微弱希望。但到了他临终前在神户所做的“大亚细亚主义”讲演,无疑已成20世纪初中国人亚洲主义的最后绝响。

三、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论在中国的反应及其论争

就在宋教仁发表上述批判日本的文章之后不到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局势出现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聚变,这给新兴帝国日本提供了施展实力和谋求区域霸权的绝好时机。1914年7月28日,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宣战,旋即所有世界强国都参与到大战中的时候,人们感到的是“文明末日”的到来。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这样描写此战争:对成长于1914年以前的一代而言,这个分水岭前后对照的差异实在太,许多人简直无法把现在和过去做任何连接。而那场战争摧毁的是“19世纪崇高伟大的文明大厦”。这场战争“基本上是一场欧战”,霍布斯鲍姆继续说:但是“最实际的要数日本,它几乎立即加入协约国,为的是接替德国在远东和西太平洋的地位。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事务,日本却毫无兴趣”。^①而日本的迅速宣布参战,以及阻挠邻邦中国的参与欧战并提出霸道无理的“二十一条”,则完全证实了宋教仁“日本者实扰乱东亚和平之张本人也”的洞见。也由此,20世纪上半叶中日外交政治关系进入到危机不断升级的时期。

与亚洲主义问题相关联,我们注意到,随着日本的参战并开始强力推行其“大陆政策”,在国内思想舆论界出现了新一轮有关“大亚洲主义”的论述。较之中日甲午战争后以德富苏峰《大日本膨胀论》(1894)为代表的咄咄逼人之扩张主义亚洲论不同,此次讨论中“日本盟主论”或“日本主义”的倾向比较隐蔽,且是在“一战”爆发而世界政治秩序发生重大重组、区域主义将成为未来国际趋势这一历史预测下展开的。就是说,现实世界政治的演进和日本国家战略的展开是这次讨论的直接背景,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主要以势力均衡论、门罗主义和帝国主义论为基础的,这种典型的政治亚洲主义论述必然成为配合日本帝国谋求扩张的言说。其中,早期亚洲主义的文化连带要素已经不见踪影。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1916)和浮田和民的《新亚细亚主义》(1918)。

小寺谦吉早年赴美,曾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法学,属于明治时代典型的“洋学绅士”,后从政官至众议院议员。1916年出版《大亚细亚主义论》(东京:宝文馆),以大量篇幅介绍了欧美的黄祸论,暗示将有发生人种战争的可能性,故认为有倡导大亚细亚主义之必要。他强调:“支那其国大而武力衰落,日本其武力强大而国小。日本在政治上帮助支那,支那在经济上补日本之不足,联袂而立,则这对东亚双生子方能共存。然而如今列强均势之下,此法虽是胆战心惊的保独立之策,可是将来白人一旦将恐怖、嫉妒及野心并用,定将掀起一大风潮,我们不能不采用防备之策,因此不得不倡言大亚细亚主义。”^②按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的观点,到了大正时期(1911—1925)随着政府“大陆政策”的实施,日本政界中出现了积极倡导“大亚洲主义”的论调,小寺谦吉就是其中代表。不过,他的大亚洲主义论乃是要以“防御性、消极的和平论”来对抗白人“攻击性、积极的征服论”。因为,“从明治维新到大正时期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相呼应,乃是一种积极推进大陆政策的、能动的攻击性亚洲主义,但大正三年(1914)再次复活的大亚洲主义却更带有被动的、保守姿态。因为,美国对日本移民的限制问题所导致的反美潮流乃是大亚洲主义复活的主要原因”。^③

浮田和民是活跃于明治末年到大正时期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早年也曾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后长期任职早稻田大学等,教授政治学和西洋史,也曾担任大众舆论期刊《太阳》杂志的主笔,被视为当时日本自由主义派思想的代表之一。他的《史学通论》(1898)讲义曾影响到梁启超的新史学建构。而其政论著作

①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7—29页。

②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转引自藤井升三:《孙文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66年,第215页。

③ 藤井升三:《孙文研究》,第216页。

《日本之帝国主义》《伦理帝国主义》等，主张“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立宪主义”，代表了明治末期帝国主义论形成阶段日本自由主义者最热衷的观点。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论，试图通过伦理、自由、人格等文明要素将帝国主义道德化，使之成为后发达国家日本在霸权竞争中谋求发展、扩张的理论基础。1917年前后，他也参与到“大亚洲主义”的讨论中来，其论文《新亚细亚主义——东洋孟禄主义之新解释》在《太阳》杂志上发表后，立刻引起了中国舆论界的关注。《东方杂志》第15卷第11期（1918年11月）就刊出了高劳（杜亚泉）的译文，由此成为中国舆论界讨论“大亚细亚主义”的直接导火索。

浮田和民首先将亚细亚主义分为三种：即“旧亚细亚主义”“新亚细亚主义”和“新新亚细亚主义”。所谓“旧亚细亚主义”指近代以前日本中国朝鲜等实行的“锁国主义”，“新亚细亚主义”则为德富苏峰《大正之青年与帝国之前途》所代表的亚细亚孟禄主义（即日本盟主论之亚洲门罗主义），而“新新亚细亚主义”才是他所要倡导的新主张。这个新主张要点有七项之多，综合起来不外三条：

第一，亚洲主义强调亚洲之事务由亚洲人自己来处理，但其范围不限于亚洲人种，只要是居住于亚洲地区者无论白人黄种人，都可以认定为亚洲人。就是说，不再以人种历史语言等文明尺度，而是以国际政治上的区域概念划界。也由此，浮田和民得以避开以往亚洲主义那种赤裸裸的日本盟主论。

第二，亚洲主义的原则在于“维持现状”，但不排除未来有变更的可能性。所谓“维持现状”，意思是并非“非驱逐欧美人势力于亚细亚之外。代之以日本人而处理亚细亚，乃不愿亚细亚如非洲之为欧美列强所分割而已”。就是说，福田试图表明，他的亚洲主义并非“攻击性、积极的征服论”而是“防御性、消极的和平论”。而所谓“未来有变更的可能性”，则在彰显其主义的最终目标在于世界和平。只不过，鉴于目前难以立刻实现，故“维持现状”是第一要务。福田“维持现状”的论述，虽然遭到了李大钊等中国学人的批判，但客观地讲，他也是在“一战”结束而世界未来走向成为议论焦点的背景下提出的。也因此，他强调“余固深望战后世界的平和同盟之成立，然如此世界的大组织，决非旦夕所可成。……故我辈之意见，以为世界的平和同盟未成立之先，当组织欧美亚三大陆之部分平和同盟”。

第三，对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强硬的对华外交多有反省和批判。浮田和民承认“日本立于东洋保护者之地位，其责任至为重大”。但观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华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往往陷自己于不利的地位。日俄战争以前，为了牵制欧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日本曾向中国提出一部分或沿岸地区不割让的方针，即“支那保全论”。然而，“日俄战争后，犹蹈袭战前之政略，殊与时势相背。盖日本既为东洋之保护者，乃向被保护者开强硬之谈判，实自杀的政策也。……故日本人对于中国之急务，宜先改自身之心理状态，勿讥詈中国人之无能无识。西洋诸国固应抛弃其瓜分中国之野心，然日本人尤宜先抛弃其以中国或数州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小政策。日本人所取之大陆政策，不特中国本部，即十八省以外之领土，亦当使之保全，向东洋全局面，宣布亚细亚孟禄主义之大义而实行之”。

以上，是浮田和民“大亚细亚主义”主张的基本内涵。比之日本早期的文化亚洲主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盟主论式的政治亚洲主义，这里的观点已经摆脱了文明论和文化连带的局限而更倾向于新的区域主义主张，其帝国主义扩张性的倾向也似乎温和了许多。但是，从当时最新的世界潮流即民族自决和殖民地解放的观点来看，他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追求民族独立和各国彼此平等的原则，更缺乏基于世界革命理念的国际主义精神。虽然，他对日本一直以来推行的“大陆政策”多有反省，但依然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为其提供理论基础的。就是说，浮田和民的观点看似温和，但与日俄战争后成为“大陆政策”之一翼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仍一脉相承，目的在于确保帝国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地位。从接受了俄国革命影响而身处被压迫民族地位的中国视角观之，这样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而不能不让人感到某种“压迫”（李大钊语）。因此，该文在中国一经介绍便招来了反对之声。例如半年后，就有署名高元者在《东方杂志》第16卷第5期发表《咄咄亚细亚主义》予以驳斥。而1919年李大钊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①亦直接针对德富苏峰、小寺谦吉和浮田和民的论述。到了同年《法政学报》第10期进而出现商榷文章，并引来李的答复《再论新亚细

①《国民》杂志，1919年2月1日1卷2号。

亚主义——答高承元君》^①，则“五四”运动前后这场围绕“大亚细亚主义”的讨论已然形成了小小的热潮。

如前所述，这场讨论大致从1916年开始，即小寺谦吉出版《大亚细亚主义论》的同年。那时，曾有章锡琛的《大亚细亚主义之运命》^②发表，批评其徒有空洞的旗号而缺乏具体的实践计划。而1916年至1919年正是欧战烽火连天的时期，大战将导致世界格局发生怎样深刻的变化，之后又将走向何方？围绕这样的问题，中国舆论界如《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出现了一股讨论大战结束后世界走向的热潮。这也是人们关注“大亚细亚主义”更为根本的世界史背景。章锡琛此前还曾据德国人台利史文《欧亚两洲未来之大战》^③而预言：“今日东亚之状态，方纷纭扰攘，陷于内部之争乱，然至欧洲之战云既收，交战各国和约告成，则东亚诸邦，必将联合缔盟造成强国之浑一体。而代表黄白两人种之两种文明，必将于斯时起莫大之冲突矣”。尤其是“最近之日本已然得欧洲机械文明于手中，若与静之文明的中国联合，必将成为西欧的一大威胁”。这明显地还有已流行二十余年的“黄祸论”，即东西文明冲突论的色调。而刘文典（叔雅）在同年《新青年》2卷2号上发表的《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醒》，则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口气，指出欧战给人类带来的三大教训：和平为痴人说梦、强权即正义、黄白人种不两立。为了对抗西方的黄祸论，刘呼吁中国青年要有自觉以保护东洋，并主张以中国为盟主的亚洲主义。

到了欧战结束之际，上述议论更成了中国舆论界关注的切近话题。例如，《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1919年1月）上载有罗罗摘译自美国《亚细亚杂志》上的《世界之三大势力》。文章认为，欧战后“则世界国际势力，必日趋于统合”，从而形成“三大系统”，即盎格鲁撒克逊系统（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斯拉夫系统（俄国及其同种之诸小国）和东亚系统（中国与日本），可谓世界大势三分天下之论。同期《东方杂志》还发表有译文《澳洲之孟禄主义》，介绍澳大利亚首相威廉马理斯许士和新西兰首相马舍的门罗主义主张。由此可见，1919年前后，中国舆论界关注世界未来走向的论述相当盛行，而有关大亚细亚主义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产生的。

回到高元《咄咄亚细亚主义》的反驳文章。高元的基本判断是：“亚细亚主义，就是亚细亚孟禄主义。”他援引李大钊《Pan……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1918）的观点，指出：“要知孟禄主义因为自己能力尚薄弱，所以只求人们不起野心，也就暂时干休。这并非不想扩张势力的好意，它的保守的态度，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并非永久的现象。故摇头一变，后身就是个‘大……主义’了。”以此为前提，高元分析目前日本有两派“亚细亚孟禄主义”，他们分别以德富苏峰和浮田和民为代表，主张“亚细亚之事，当由亚细亚人处之”，不同只在是否明确主张“日本人代表亚细亚人，亚细亚为日本所独有的势力”范围而已。因此，从批判门罗主义的立场出发，高元结论道：“亚细亚主义者，日本独专之干涉主义也。亚细亚孟禄主义者，日本因无暇力及亚洲以外，而独称雄于亚洲，故不过为政策上之专横主义耳。苟至他日，其力已足以出于亚洲之外，将渐脱其假面，而树侵略的方策。即，浮田和民氏所谓具有现状变化的可能性也。”由此，他最后试问：“这不但是我们东亚的独立国不能忍受，就说欧洲各国，眼见日本人这么强横，可以忍受吗？”

我们不能不说这篇文章的分析是有洞见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经过了1920年代短暂的“协调外交”之后，从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到最终发动中日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其大亚洲主义最终也走向了侵略扩张的深渊。不过，在当时中国舆论界有关“大亚细亚主义”的讨论中，高元的观点依然是在传统的均势论、区域联合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批判的范围之内，而真正把全新的民主思想、世界革命的理念和民族自决的精神带到讨论中来，并从正面提出建设性的“新亚细亚主义”主张的，则要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李大钊了。李大钊的相关思想不仅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式“大亚细亚主义”在中国不被接受的历史和伦理逻辑，而且以社会革命的全新路径将世界联邦作为高迈理想高悬于他的“新亚细亚主义”之上，从而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新主张。这乃是此次讨论的最大收获。

①《国民》杂志，1919年11月1日2卷1号。

②《东方杂志》，1916年5月13卷5号。

③《东方杂志》，1916年1月13卷1号。

四、李大钊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新亚细亚主义

李大钊对日本和东亚局势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 1913 年至 1916 年留学日本期间，他一方面通过河上肇接触到马克思的思想，为其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遭遇到日本“二十一条”的秘密出笼、袁世凯的复辟以及国内的反袁运动，这促使他开始关注日本乃至中日关系问题。在留日学生总会调查日本与中国政府就“二十一条”如何进行秘密交涉的过程中，李发表了代表总会的檄文《敬告全国父老书》（1915），对日本参与“一战”而争夺德国殖民地胶州的各种阴谋予以激烈批判。另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记述：青年李大钊在日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日文书籍杂志，受到过包括加藤弘之、浮田和民等的影响。他虽反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但并不拒绝与日本的交流。例如，大正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组织“黎明会”时，他曾予以声援；“五四”运动导致排日浪潮高涨而影响到中日关系，他则与吉野合作推动中日学生的交流事业。^①

《敬告全国父老书》从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均势论入手，讨论列强集体瓜分中国而为一己之私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致使中国暂且免于立刻亡国的危运，但瓜分却愈演愈烈。甲午战争之后，更有日本挟战胜之余威，“索我辽东半岛，外交黑幕，捭阖纵横”。而所谓“势力范围”者，则是列强瓜分过程中避免纷争而划定的界线。如今，更有美国于 1900 年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以谋“利益均沾”的均等主义。李大钊敏锐地看到：“致中国于将亡者，惟此均势；延中国于未亡者，为此均势；迫中国于必亡者，亦惟此均势。”就是说，在这样的均势制之下，不管中国如何获得暂时的残喘机会，但若无反抗则将来依然要亡国灭种。故环视东亚时局进而及于中东被殖民的普遍现状，他强调民国邦基未稳，国人当卧薪尝胆以抗列强。而论及此次日本秘密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则明确指出其欲取整个中国的巨大野心。可以说与宋教仁一样，李大钊也是最早观察到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野心的人士，而文章的最后更进而敦促政府顺应民意坚决拒绝日本的要求，显示出他此刻的民族国家意识——主权在民思想已然形成：“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督励吾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半年之后，他又著《国民之薪胆》一文，详述“二十一条”出笼经过及关键问题所在，指出日本“对于中国，则断绝根本复兴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警示国人必须卧薪尝胆，磨炼百折不挠的志气。

摆脱了当时国际关系理论中流行的均势论局限，到了 1918 年前后李大钊最终站到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和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的立场上来，从而得以对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给予深刻的理论批判，并提出自己“新亚细亚主义”先进理念。在此，我们需要在他《Pan……ism 之失败与 Democracy 之胜利》（1918 年 7 月）《庶民的胜利》（1918 年 11 月）《Bolshevism 的胜利》（1918 年 12 月）这样一个思想激越发展的脉络里，来解读其《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的深意。从观察“一战”结果的角度出发，李大钊在第一篇文章中强调其胜利不是各种各样的“大……主义”胜利了，而是全世界劳工的民主与解放意识战胜了各式各样以一国为主体的军国主义乃至资本家阶级。就是说，民主和民族解放成为其衡量“大亚细亚主义”是否符合世界新潮流的标尺。而第二篇，则更清晰地凸显出李的世界主义视野，即公理战胜强权、民主战胜专制、世界庶民战胜军国主义。第三篇，更进而提出“革命的社会主义”真正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波尔布特的战争是阶级战争，它导致“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在此，李大钊思想中的全新世界图景得以呈现：自由乡——欧洲联邦民主国——世界联邦，一个多元递进的三级结构。他在《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中所提出的设想，亦被置于这样的结构之中：各民族的独立解放——亚细亚联合——世界组织（联邦）。这无疑是奠基于一高远的世界主义理念之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梁启超、章太炎的文化亚洲主义乃至同盟会以来革命党人中时隐时现的亚洲意识——以民族国家为基准的政治亚洲主义亦有根本不同。

因此，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能够对小寺谦吉、浮田和民等所代表的新一

① 石川祯浩：《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赵景达等编《东亚的知识人》卷三，东京：有志舍，2013 年，第 25 页。

轮大亚细亚主义提出尖锐质疑,称其所主张者并非平和而是侵略主义。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这代表了五四时期一般中国知识阶级对日本的普遍忧虑,预示了此前的“东亚意识”的根本转变。而李大钊同时提出的与日本针锋相对的“新亚细亚主义”观,其社会革命的视野、民族自决与解放的原则和世界联邦的理想,也已与源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各种亚洲主义截然不同。^①例如他强调:“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邦,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我们亚洲也应该成一个相类的组织,这都是世界联邦的基础。亚细亚人应该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与浮田和民氏所说的也不相同。浮田和民主张拿中、日联盟作基础,维持现状;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②

李大钊这里所谓的“新亚细亚主义”明显有来自威尔逊《十四点和平纲领》^③的影响,并与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相一致。辛亥革命之后,列宁还曾热情地预示“亚洲的觉醒”:“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④这个亚洲觉醒的世界史背景,正预示着波涛汹涌的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它给一切思想主义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路径。在这样的思想路径引领下,将民主精神和世界主义作为“新亚细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内在逻辑归结,这是李大钊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最大区别,也明显地不同于19世纪以来的均势论和区域联合之“泛……主义”的逻辑框架,使其主张得以成为一个高远的超越了民族国家乃至区域范围的全新理念。这在中国20世纪有关亚洲论述的历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为了深入领会李大钊的新亚洲观,我们有必要对其回应质疑之声的《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一文再做些深入的解读。

李大钊的文章发表以后,有高承元者提出反驳的意见,即为什么不主张世界各民族直接联合起来,造成世界的联邦,却要各洲的小联合作个基础?就是说,质疑者的疑虑在于那个实现世界大同的递进式三级结构——民族解放、亚洲联合、世界联邦。我理解,高承元亦与李大钊共享着一个由“一战”和俄国革命所引发的世界革命这一大的思想史背景,所以才会有联合所有无产者或各民族直接抵达世界大同的思考方式。而李大钊从八个方面回应了质疑者的疑虑,其中最能显示其逻辑理路的是以下三条:

第三,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而倡的,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而倡的。我们因为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我们才要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大旗,为亚洲民族解放的运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是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

第四,我的新亚细亚主义,不是“有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乃是“适应世界的组织创造世界联合一部分的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乃是顺应世界主义的。……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

第五,我的新亚细亚主义,是“自治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不是“闭锁主义”。我们相信最善的世界组织都应该是自治的,是民主化的,是尊重个性的。凡欧美的人民在亚细亚境内生活的我们都不排斥。不但不是不让他们来讲公道话,并且愿意与他们共同生活。^⑤

① 赵京华:《在东亚历史剧变中重估鲁迅传统》,《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

②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

③ 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国会的演说:“对所有关于殖民地的要求作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此项调整的基础,就是要严格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在决定所有这样的主权问题时,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与管治权待决定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重视。”(译文摘自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11页)

④ 《列宁选集》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7—448页。

⑤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第290—291页。

亚洲解放运动是第一步、世界联合是终极目标，而民主化和尊重个性则是根本的原则和目的。这是李大钊赋予其“新亚细亚主义”主张的根本内涵。明显地，这已然摆脱了19世纪以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均势论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论。统治19世纪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联合思想的，是发源于欧洲的均势论。均势论借助几何学的平衡概念，试图在复数的霸权之间建立相互制衡与稳定关系。其主要功能在于防止某一国家建立全球性霸权，由此来维护国际体系的局部稳定。正如《大转型》一书作者波兰尼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均衡制也确实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了不曾有过的作用。比起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19世纪产生了西方文明史上前所未闻的现象，即1815年到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这个奇迹要归功于建立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之上的均势制的运用。波兰尼说：“就其本质而言，均势制应该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即各权力单元的生存；事实上，它仅仅假设三个或更多的权力单元运用的方式一定是按着结合弱小之权力单元的力量，来对抗最强之权力单元的力量增长。在世界史的领域里，均势制是和那些借此来维持独立的国家有关的。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各国之间合众连横的战争。”^①然而，到了帝国主义最后阶段和世界革命已经出现的20世纪初，这个均势制终于在“一战”中失去了效用。因此，当人们重新思考世界未来发展走向、重新设计我们的生活世界之际，新的理论和逻辑起点就成为必要了。李大钊早在1915年撰写的《敬告全国父老书》中就对均势论多有质疑，而上述“新亚细亚主义”论述，则更提出了民族解放、世界主义和民主精神的核心思想。它打破了以民族国家为疆域的19世纪区域主义思维——均势论，也摆脱了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本根弊端——日本盟主论。这是我们高度评价李大钊亚洲论的主要原因所在。

李大钊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思考，还暗含着一个思维模式的问题，即其思想的包容性和复杂化倾向。在二元对立思维中包含一个（或数个）“中间项”，从而避免二元对抗和抹杀他者的简单化思维。这在“五四”新文化人一般倾向于直接、对立的二元思维——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光明与黑暗——的思想场域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由于把民主原则置于其“新亚细亚主义”的核心位置，李大钊得以从容地建立起一个包含多项选择和复杂化思维的架构。例如，民族解放、亚洲联合、世界联邦的三极递进式社会革命的构想，便是如此。又比如，在回应高承元“亲疏有别的亚细亚主义”的质疑之际，李强调我们反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并非因为它源自日本，“压迫亚人的亚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亚人的非亚洲人，我们也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非亚洲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亚人，我们也是反对。”反之，解放“亚洲民族”的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亦如此。因此，李大钊能够在讨论中最终给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结论：“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 Democracy 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我们情愿和他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这是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的精神。”^②

结论：亚洲意识在中国的消退及其启示

以上，本文重点考察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有关“大亚细亚主义”讨论的内涵，同时追溯了近代以来中国人亚洲主义或东亚意识发生发展的谱系及其最终消退的历史轨迹。我认为，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开启了思考亚洲合作的全新路径。它不仅超越了日中两国近代以来各种亚洲主义的思考范围，而且对日本帝国主义式的“大亚洲主义”构成了深刻批判，也足以作为我们今天思考区域合作问题的重要参照。然而遗憾的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并未能进一步深化这种“新亚洲主义”论述，而曾经仅有的一些“东亚意识”也逐渐消退。究其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作为新兴帝国主义的日本表面上倡导东亚联合的大亚洲主义，实际推行的却是西方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逻辑，不仅对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更欲蚕食和吞并整个大陆中国。这自然造成了东亚区域内部的不平等关系结构，导致中国人对李大钊所言的“亚洲

① 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56页。

② 李大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

联盟”亦失去信心。而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在早期基本上是一个从文明论和区域连带情感出发而形成的一种思潮，后期则转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政治亚洲主义，这对开始进入到社会革命阶段的20世纪中国人来说，已经失掉了感召力也属必然。

我还觉得，亚洲主义或东亚意识在中国20世纪初的急速消退，可能也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中有关区域主义观念的淡薄，故始终未能形成足够我们今天参照的东亚思想资源。与此相关联，我们在学术方面有关日本、朝鲜半岛等的研究成就不高，在文学艺术方面则少有涉及东亚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作品出现。这恐怕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最近有学者指出：《新青年》与《甲寅》乃至清末民初杂志的不同，在于并不纠缠于具体的争论以及政治，而“更倾向于一种通过纷繁的政治现象，重新理解当时中国的总体性结构和时代精神状况，寻找解释和解决的方案”^①。这个“总体性”体现在从全新的政治理解下囊括种种社会问题而加以讨论。而在我看来，这种对“总体性”的追求同时也铸就了“五四”一代知识人的以下思维模式，即在二元对极的关系结构中观察世界大势，以思考“文化”的总体解决。这种思维模式对后来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影响至深且广。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中国解放与世界革命……我们的观念思维中始终缺乏一个“第三维度”。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角度讲，是缺乏区域主义的思考；而从文化战略和思维模式的视野看，则是少有可能突破二元对立思维结构的“第三项”思考。

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国现代学科建制中一直缺乏在欧美十分发达的“区域”研究，例如欧洲的东方学、非洲学包括“二战”之前的殖民地学。又如，日本战前的大学里殖民政策学从无到有逐渐发达成独立的学科，战后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为“地域研究”，至今成果丰厚。这当然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政治要求息息相关。中国的问题是近代以来国力衰微，现代化的历程举步维艰，又加之新老帝国主义势力的威逼和掣肘，使之无暇顾及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的观察和研究。而“五四”以来在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二元结构中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促使我们的学科建制于“区域研究”方面发展薄弱。其中，“五四”前后亚洲主义或东亚意识的消退，是否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的特征。在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已经到了必须真正参与到世界之中并与其共同发展的阶段。与此相适应，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区域的研究，也到了势在必行而需要深入开掘的时刻。在此，回顾一百年前曾经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出现的有关“大亚细亚主义”的讨论并思考中国人东亚意识消退的后果，也就自然有其意义了。

最后，我想就观察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思想史中的东亚视角问题，再做一些赘述。以往我们注意从“一战”和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角度来看待“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而日本学者则注意到“东亚视角”的重要性。即，这个时期在日本是“大正民本主义”、在朝鲜半岛则为“三一运动”爆发的时期。东亚三国知识分子在共享一个欧战爆发引起世界革命的全球背景同时，也在本地区形成了互动和共振。其中，和平和民族自决是其共同的主流意识，而背后则包含着民众、改造、解放等更为深刻的思想底流。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朝鲜的三一运动，其主体大都是留日学生，他们也共享一个日本大正民主主义时代的思想氛围。其中，“改造”的思想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关联，而民本、民主的思想则是三国共同的主流。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才开始走上独自的现代化道路。^②我们讨论五四时期的亚洲主义问题，一方面是要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地区所带来的后果，反省19世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均势论思维弊端，另一方面也是要提请注意，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必须注重其中的东亚区域特别是日本的因素，无论是在正面还是在负面的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东亚地区，其社会历史的大变动本来是在一个共同迎拒外部势力、构建民族国家乃至区域空间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中的各民族相互渗透彼此激荡，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复杂缠绕的结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倡一种观察中国现代问题的东亚同时代史视角，以丰富我们对于历史复杂性的理解。

（责任编辑：张曦）

① 张春田：《“有以自觉而奋斗”：〈新青年〉的取态》，《读书》2015年第8期。

② 赵景达等编：《东亚的知识人》卷三“社会的发现与变化”序言，东京：有志舍，2013年，第2—9页。

（下转第120页）

四句几乎全同，前半大多不同，是一诗之两次写作，具体关系不明。

此外，《白头吟》亦存两稿，诗稍长，在此从略。

李白是天才的诗人，诗思纵横，才思敏捷，言出意表，想牵世外，历代论之多矣。清人黄周星甚至有太白写诗用胸口一喷即成的夸张称许。其实天才纵逸的另一面，则是极度勤奋地学习与修改。相传李白早年曾拟《文选》数遍，今存文集中之《拟恨赋》即其孑存。其于自存诗稿反复修改，本属情理中事。本文列举诸多内证，希望学者理解李白诗集中有定稿，有初稿，尽管二者皆存者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但这些记录如能得到正确认识，并据以梳理李白创作和修改的思路，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在最近写定李白诸诗时，不仅逐一出校记录，且努力将文本相近的诗篇归并在一起，以便学者研读。当然，牵涉到几十首诗的改写，难以展开讨论，学者谅之。

（责任编辑：张曦）

An Analysis on the Textual Variants of Li Bai Poetry

Chen Shangjun

Abstract: Regarded as a poet of genius, Li Bai's achievements were also due to his diligence. On the basis of a thorough collation of typical rare editions, transcriptions and anthology of Li's works, this dissertation eliminates several forgery parts and points out that Li Bai revised his poetries frequent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us some first drafts and final versions were both preserved in the current editions collected by later ages. These textual variants might provide some clues to understand Li's creative ideas in his poetry writing.

Key word: Li Bai, poetry textual, textual variants, process of writing

（上接第 132 页）

From Late Qing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Fading of Pan-Asianism in China and Its Consequences

Zhao Jinghua

Abstract: Betwee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1919, there existed in China a wave of discussion about Pan-Asianism. Especially, Li Dazhao advocated the New Asianism that was based on the emancipation of colonies, the self-decision of nations and the globalism, which had a great value an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owever, with the fading of Asia-awareness in China, the discussion regarded as thought resourc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disappeared in the history chao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n-Asianism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nd continue to analyze the reasons accounting for its fading and the relevant consequences. Finally, it tries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ast-Asian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provide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 brand-new thought for the future reg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 Pan-Asianism in modern China, Li Dazhao, intra-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